

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

清代赋学研究

□ 孙福轩 著

明末清初的经世文统与赋学思想 康雍年间的赋风与赋论
乾嘉道时期的赋学理论 乾嘉道时期的赋学专著
以同光、光绪朝为主的晚清赋学 清末民初的赋学理论
清代赋学——古典赋学的总结与超越 清代赋论家年表

浙江大学出版社

02

中国诗词曲赋研究丛书

清代赋学研究

□ 孙福轩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赋学研究 / 孙福轩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308-05932-9

I. 清… II. 孙… III. 赋—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606 号

清代赋学研究

孙福轩 著

责任编辑 钟仲南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 (传真)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18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932-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赋在我国是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在汉代最称繁盛。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推究赋体渊源，以为汉赋之兴，远承古诗之赋义，近得楚人之骚体，所谓“受命于诗人而托宇于楚辞也”；至其成立，实因于屈、宋的努力，使“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后经汉魏六朝，至于明清，历两千余年，可谓源远流而流长，其名篇佳作，流播人口，影响深巨。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的作者热心于辞赋的创作，虽然今赋与古赋相较，面貌已自不同，但赋之为赋的基本特点还是坚守着的，说明这种文学样式还葆有艺术的生命力，故能一脉相承，于今不绝。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又是一种聚讼纷纭、极多争议的文学样式。争议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这两方面交互错综，推动赋学的发展。一者有关乎赋体，即赋与诗文的关系。一般认为，赋是介乎诗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其敷陈之辞得之于文，其比兴之旨则得之于诗。又赋的诗性特质不仅表现在对偶、声韵等形式的因素，而尤着重于作者情志的抒写。然偏诗偏文，畸轻畸重，在创作实践中常有摇摆。赋论史上的所谓古律之辨、骈散之争，大抵与此相关。一者有关乎赋用，特别是赋与政治的纠葛。汉赋的发达，本缘于统治者的提倡，但一旦让辞赋创作直接为政教服务，做了政治的奴婢，那肯定会使其趋于衰歇。汉大赋至汉末让位于抒情小赋，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反之，设使辞赋创作根本脱离政教，让赋家拒绝一切社会承担，完全回到所谓私人化的空间，则也不免导致其堕落。我们揆诸赋史，可知一切传世之作，不论其为述志，为抒怀，为咏物，为讽世，其根基总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中有作家心灵的参与，有真切情感的体验，其动人心魄的艺术形式与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是结合着的。辞赋与政治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也是赋论史上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可见，对两千余年的赋史作认真地梳理，寻找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嬗变的内在规律，总结辞赋创作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学遗产，而且对发展当今的辞赋创作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问题是返观国内学界对于中国赋学的研究，还未见有令人十分满意的成绩。即以赋论来说，作为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相对于诗文、词曲、小说理论，也要明显地滞后。其

基础资料未及作系统的整理,通代研究、断代研究著述寥寥,且偏于汉魏六朝,对唐宋以后的赋学理论较少关注。清代赋学号称复兴,理论批评达于颠峰状态,但对它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受到重视,产生了有数的几项研究成果。这种状况使学界同仁产生一种紧迫之感,觉得确实有必要振奋精神急起直追了。

本书作者孙君福轩可是一位有心之人,估计他早就注意及此,开始搜集有关赋学的研究资料。大概2003年年末吧,他交给我一份唐宋辞赋理论的研究纲要,乃知他对赋学抱有兴趣。但在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时,却改为《清代赋学理论研究》。对此我不无突兀之感,而在福轩则事出有因。第一,清代赋学是中国古代赋学的终结,它带有一种集成的性质。这一方面固然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同时却也拓展了学术的空间,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第二,福轩读硕时,做的是明清小说理论,对于明清的史事和文学相对要熟悉一些,这于他从事清代赋学研究是有利条件。我本人对中国赋学并无研究,但我尊重福轩君的选择,觉得其眼光其勇气皆有可佩。

福轩君专业学习非常努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论文撰写,并通过答辩;初稿得二十余万字,后经修改增益,至于四十万言的洋洋大观。今我披览一过,联系到福轩平日写作的情形,觉得有三点印象比较深刻。

一是勤于搜求。除了赋学的专门著作之外,举凡史书、子书、类书、传状、碑记、奏对、书信、序跋等等之中与赋学有关者,都在他的收集范围之内。其中有些尚未整理出版,而仅见于内地公私收藏,他就不得不挤时间去京、沪、宁等地访书;有些资料远在港、台,他也要借助于现代通讯手段,千方百计罗致。我们看他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达227种,文中征引的论文著作为数更多。其搜求之勤苦,可以概见。福轩君所以能够这样做,就缘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把研究资料的搜求视为论文写作的基础,观点要从材料引出,为文不作无根之谈。这就使其著述有可能不同于凭借一部电脑,东拼西凑,抄撮成文。

二是对史实的考订和取舍态度审慎。即材料收集来了之后,一定要经过目验,然后决定取舍;虽然其中很多材料经人用过,仍然不能少了这道手续。例如清代赋学的分期,文中列举四说,应该说是基于同样的史实,但各人有不同的观察。作者经过比较,以詹说为基础,提出四期五段说,言之凿凿,诚亦不失为一家之见。又如李调元《雨村赋话》,已有学者考论其与汤稼堂《律赋衡裁》之沿袭与创新的关系。但本书作者经过两书条目的详细比勘,提供了更为翔实的依据;同时指出,相对于汤氏而言,李调元是第一位有意识地以赋话的形式构建清代律赋学的学者,影响清代赋学至巨。而史家所叙,往往独表调

元,不及汤氏,故本书作者特以二书合论,具体阐明其承创因革的关系,既肯定李调元在赋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又不没汤稼堂的理论贡献,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用心细密,态度和方法均极可取。

三是在理论阐释上颇多致力。理论阐释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同是对清代赋学的观照,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从大文化的视角切入,着重于当时学术氛围、时代思潮的挖掘,以凸显其对辞赋创作和赋学理论的意义;詹杭伦著《清代赋论研究》则属于清代赋学的横向研究,问题意识较强。福轩君此书却是以时间为序,对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赋学理论作系统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清代赋学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及其嬗变轨迹。这种写法最是平实,最不讨巧,但认真地做去,却也比较能够见出作者的功力。乾嘉道时期是作者用力最多的一个章节。盖其时赋家蜂起,赋作如林,云蒸霞蔚,一时称盛;兼以嬗变之曲折,理论之纷争,故其内容特为繁多。但经作者的擘肌分理,使我们对于此期赋学的了解,也就觉得条理井然,主次分明,并不难窥其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在叙述中间,对学界既有成果,当然会有所借鉴,同时也有所引申,有所发挥,有所辨证。例如在介绍乾嘉道复古思潮中赋论家的体类之争以后引出的一段议论,就包含了作者自己的裁断在里面。他如第一章张溥、陈子龙赋学批评的评述,第三章章学诚“取经义以致用”赋学观之利弊得失的分析,以及最后一章对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诸人赋学“复古”观的比较研究等,亦皆有新意可采。

上述几点印象其实并无特别之处,一般讲基本学术训练,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当今之世,学风浮躁,取巧之法实在太多,能坚守学者本分转觉不易。而且在我看来,正因孙君在这些方面有所坚持,遂使其研治清代赋学的第一个成果,虽然还略显稚拙,其组织结构及观点材料亦不无可议之处,但就总体而言,应该说是一部比较扎实厚重而有一定学术含量的著作。

福轩的专著得以出版,当然是可喜可贺之事。但清代赋学是大题目,以后要做的工作不但不会轻松,可能难度反而更大。且不说因为它的集成性质,要求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必须贯通两千年的赋史;更不必说清代赋学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关涉诸如政治、思想、科举、学术、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即以清代赋论本身而言,也还有许多新材料有待发掘与整理,对于既有的材料则需作进一步的深入钻研。平常我们总以为理论研究枯燥乏味,其实倒不尽然,只要拿它与文学创作相联系,理论研究就会有丰富生动的内容;而做理论专题的人如能兼做个案分析,则必定有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只是所有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大不容易,需要积以时日,需要付出心血,非可以一蹴而就者。好在福轩君为

学勤勉,能刻苦自励,相信他在清代赋学乃至整个中国赋学领域里,将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地工作,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对此我抱有信心,怀有期待。

福轩君山东人氏,自2000年秋负笈南来,迄于今,亦有七八个年头了。中有三年,我忝为导师,得与之常相过从,其间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固不乏文事切磋之乐。今福轩君论文即将付梓,属序于我,我不能无感。因撰为小文,略述写作缘起及经过情形,所言未必切中肯綮,亦聊寄为颂为祝、以期以盼之意云尔。

韩 泉 欣

2008年2月16日,于米德兰城居室窗下

目 录

导 论 赋的起源与清代赋学的研究现状

第一节 赋的起源与体类	(1)
一 赋的起源	(2)
二 赋的体类及流变	(11)
第二节 现代赋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3)
一 清代以前以汉魏六朝为主的赋学批评	(14)
二 清代赋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21)
第三节 清代赋学批评的分期与形式	(30)
一 清代赋学批评的分期	(30)
二 清代赋学的批评形式	(33)

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经世文统与赋学思想

第一节 明末赋选本的复古思潮	(38)
第二节 以张溥、陈子龙为代表的六朝辞赋批评	(40)
第三节 清初赋学的骚情与雅丽	(45)
一 骚体赋作与赋论的重情	(46)
二 清初赋论的“博洽雅丽”	(51)

第二章 康熙年间的赋风与赋论

第一节 康熙年间赋风的醇雅转向	(62)
一 对六朝辞赋的推尊	(62)
二 康熙年间赋学的醇雅趋向	(64)
三 康熙年间赋论的情感与艺术特征论	(71)
第二节 赋源“六义”与经世致用——康熙及其宰臣的赋学观	(73)
一 康熙的实用思想与文论观点	(74)

二	康熙的辞赋创作与赋学观点	(77)
三	康熙的辞赋观对辞赋创作的影响	(79)
第三节	康雍年间选本的赋学观	(81)

第三章 乾嘉道时期的赋学理论

第一节	赋风的流变与赋论倾向	(91)
一	“赋颂一体”论及其赋学观点	(92)
二	“以古文为时文”及其对辞赋观的影响	(104)
三	统治者的辞赋创作及其对辞赋的态度	(109)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的辞赋观	(112)
一	推尊古体的赋学倾向	(112)
二	《总目》的历代赋学批评观	(115)
三	对辞赋创作的影响及成因	(118)
第三节	乾嘉道时期辞赋家的赋学观点	(122)
一	以气为主——古文家派对辞赋的看法	(123)
二	赋兼才学与重情尚美——学者和骈文家的赋学观	(131)
三	取经义以致用——文章社会学家的赋学观	(147)
四	词赋为宗——诗人、词家的赋艺表达	(152)
第四节	乾嘉道复古思潮中赋论家的体类之争	(157)
一	律体宗唐——律体赋派的理论	(158)
二	祖骚宗汉——古体赋派的理论	(170)
三	古体派与律体派赋学思想的论争与调和	(188)
第五节	沉雄博丽与清丽芊眠——赋学风格论的确立	(195)
一	诗人之赋“丽以则”	(195)
二	沉博绝丽	(200)
三	清丽芊眠	(204)
第六节	乾嘉道时期赋选本中的赋学思想	(209)
一	律体赋选的偏盛	(210)
二	古体赋选的回应	(216)
三	古律赋选的汇通	(218)
第七节	乾嘉道时期赋学兴起的主要成因	(221)
一	帝王的尊崇与科举考试的持续推动	(222)
二	清代赋学的尊体观念	(225)

三	清代乾嘉学术的影响·····	(229)
第四章 乾嘉道时期的赋学专著		
——以《律赋衡裁》、《雨村赋话》为中心		
第一节	李调元的生平及《雨村赋话》的主旨·····	(232)
一	李调元的生平及著述·····	(232)
二	《雨村赋话》的编纂体例及主旨·····	(234)
第二节	《律赋衡裁》、《雨村赋话》的赋学内涵·····	(237)
一	《雨村赋话》与《律赋衡裁》的关系·····	(237)
二	《律赋衡裁》、《雨村赋话》的赋学理论·····	(240)
第三节	《复小斋赋话》与《读赋卮言》·····	(252)
一	浦铣的《复小斋赋话》·····	(252)
二	王芑孙的《读赋卮言》·····	(255)
第五章 咸同光时期的赋学理论		
第一节	道咸年间赋学理论的承转·····	(260)
一	律体赋学的去唐律而尚时趋·····	(260)
二	古体赋学的再次复兴·····	(268)
第二节	同光年间的古体赋论·····	(270)
一	以古为律——古律之争的融合与发展·····	(270)
二	汉魏骨法——曾国藩的赋学观·····	(275)
三	祖骚宗汉——刘熙载的古体赋批评理论·····	(282)
第三节	汉魏义法与晋宋风味·····	(288)
一	辞不泛滥,汉魏义法未沦·····	(289)
二	参义于古法,酌秣纤而折中·····	(295)
第四节	晚清赋学选本与赋学批评·····	(301)
一	赋作体类——以律为主·····	(301)
二	赋选倾向——以古入律·····	(307)
附	姜国伊及其《尹人赋话》·····	(311)
第六章 清末民初的赋学理论		
第一节	崇汉祖骚,兼采六朝的复古论·····	(318)
一	自然为宗,骈散兼采——以李详为主骈文家的赋学观·····	(319)

二	赋源与赋艺——古文家对传统赋论的再发展·····	(321)
第二节	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的赋学“复古”观·····	(327)
一	王闿运——赋以荀子为正体·····	(328)
二	刘师培——以六朝为嚆矢·····	(331)
三	章太炎——晋宋之间的清远与风骨·····	(336)
第三节	民国辞赋史及赋学复古的时代意义·····	(340)
结 论	清代赋学——古典赋学的总结与超越	
一	赋学批评意识的自觉·····	(345)
二	赋学的确立与理论体系的完成·····	(347)
三	赋学批评的风格论·····	(350)
附 录	清代赋论家年表·····	(354)
参考文献	·····	(363)
后 记	·····	(372)

导 论 赋的起源与清代赋学的研究现状

第一节 赋的起源与体类

赋的起源问题,是赋论史家和文体学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以来,主要有《诗经》渊源说,《诗经》、《楚辞》渊源说,战国诸子渊源说,纵横家言渊源说,隐语渊源说,民间艺术渊源说,多元说等数种。^① 这些主张或沿袭旧说,或从民间文化拓出新路,或从字源上探本追源,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能确定无疑地说解决了赋的起源问题。近来,学者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入手,提出“升高能赋”、“腹赋”中的“赋”为口头创作的赋体文,荀、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的假说。^② 这无论是对当时文学语境原生态的考察,还是对赋的功能与文体特征的阐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循此思路进向,提出赋源于诗六义之一的“赋”体假设,并在当时的尊经思潮中给出具体辨析。

① 赋的起源问题现代学者也多有论述,但大体不出以上几种,如陶秋英在《汉赋研究》中指出汉赋渊源应该包括楚民歌、先秦谣谚诗歌箴铭颂诔及诸子散文等,即是对章学诚的补充。朱光潜《论诗》第二章《诗与谐隐》中说:“赋即源于隐。”“赋就是隐语的化身。”也是从荀子的文化渊源来说的。关于赋源研究的具体内容,可参看李生龙《近十年的赋体源流综述》(《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和有关论文。

② 如钱志熙:《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腹赋”的具体所指》(《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本节原为与钱文的商榷文字,限于体例,作出部分调整。附注:为了行文简洁,现代的研究者后不冠以先生。

一 赋的起源

(一)“赋诗”与“赋文”——赋的原始形态的考察

由于汉代的尊经意识,赋的起源论者多以班固的“赋者,古诗之流也”为指归,一直延续到清代均是如此。如吴乔云:“赋出于诗,故曰‘古诗之流也’。《汉书》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史记》云:‘作《怀沙》之赋’,则骚亦赋也。宋玉、荀卿皆有赋,荀赋便是体物之祖。赋颂,本诗也,后人始分。屈原有《橘颂》。陆士衡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赋不同也。”^①强调赋、颂本是诗的一种,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后人将之一分为二,使两者具有了不同的文体特征。在古代的尊经论域下,先秦时代的所谓“赋”即多被阐释为“赋诗”,即借吟诵《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个人心志,这已是学界的共识。钱志熙曾提出“赋诗”与“赋文”两种方式,其“赋文”的依据主要为以下三段内容,引证如下:

《毛诗·邶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郑笺:“郑志:问曰:‘山川能说,何谓也?’答曰:‘两读。或言说,说者,说其形势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孔颖达《正义》:“……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 (《毛诗正义》卷三)

《国语·周语》:召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韦昭《国语解》:无眸子曰矇,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有眸子而无见曰矇,《周礼》眸主弦歌,讽诵箴谏之语也。 (卷一《周语》上)

《韩诗外传》: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蠹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

^① 吴乔:《围炉诗话》,郭绍虞《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3页。

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蝗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

（卷七第二十五章）

钱文认为这几段文字“实深有关于我国古代文体发生的问题”，由此细读得出：“升高能赋，所赋者并不是指诗歌，而是另一种文体，即不歌而诵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既不是赋（原文为赐，误）诗，又与后来的汉赋不同……可见赋字在先秦的场合，除了赋诗一义以外，还有赋文一体，即所谓赋也。”^①指出了在先秦时期，不仅存在着“赋诗”的现象，还存在着“赋文”的现象，这无疑对于拓宽思路，探讨赋的起源多有启发，但我们认为这里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辨明：

其一，从上述引例来看，并不能完全排除“赋诗”的可能性。对于“赋文”的原因，钱文的解释一是以“升高能赋”为“建邦能命龟”连类而引及的，“如果传文升高能赋真是指能为诗赋其形状，则传文作者岂有舍此眼前现成的例子而不加解释，必谓‘升高能赋’一种也是‘连引所及’？则于情理上是说不通的”。^②第二个原因是从文体上来说明的，“这里面，铭、誓、说、诰，都是动词而为名词。作为动词，也就是说既是指铭为器物，同时也是指铭这种文体……因此，赋也应该是这样”^③。由经文细读与词义比类而得出的论断固然能启人心智，把赋体文放在中国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语言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说明，也更为可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大量的先秦文献中，赋“诗”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赋的最为原始的本义，从字源学的角度而言为“斂”，《说文》曰：“赋，斂也，从武，贝声。”《尚书·禹贡》曰：“厥赋惟上上错。”《书传》曰：“赋为土

①②③ 钱志熙：《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腹赋”的具体所指》，《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62、60、60页。

地所生,以供天子。”据此钱文推断:“向君王或有关职掌人员缕述赋物之名,也当称赋。这种陈述,在庄重的场合,必有一定的格式与修辞、诵读的讲究。由此可见,赋并不是从诗中分化出来的,而产生于赋敛活动。诗歌以铺陈直述为赋,正是对早期之赋之借用。”^①我们对这个论断持不同意见,虽然说“登高能赋”固然不全是赋“诗”(指有格律能入乐歌唱的诗),有赋文(不歌而诵)的一面。但既然“赋”作为诗之一体(是诗的本体而不是一种修辞方式),而“诗”的原始意义或从其更为原始生态的民间叙事体来说也并不完全是入乐歌唱的,而是存在一种不入乐而诵的散文体。因此赋的原始生态与其从赋敛活动而生的口述体来追溯,还不如从“六诗”之一的“赋”体追溯更为直接,也更为接近事实。因为这种现象可以从春秋时代“尊诗”的普遍事实中得到解释,故我们对钱文的“赋并不是从中(指诗中,笔者注)分化出来的”的观点,认为有欠妥之处,是值得商榷的。

其二,《韩诗外传》中的“君子登高必赋”之赋,虽然子路、子贡、颜渊所赋为“文”,但也并不一定必然解释为赋体的起源,也并不一定能说明赋体文的原始形态。其实这里的“赋”,完全可以理解为“诗言志”中的“言”,即孔子令弟子各言其志的意思。《论语》中有相关的内容: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卷六《先进》)

孔子在这里反复申明,“亦各言其志也”,那么这里的所谓“赋”,如果从词的角度分析,也不妨换作“述”、“语”等,难道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述”“语”的文体起源吗?这于逻辑也有所不通。但钱文据经断定赋文的思路,却对我们推究赋的起源问题大有裨益,即可从“不歌而诵”的“文”的视角来深入赋体的

^① 钱志熙:《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暇赋”的具体所指》,《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63页。

探源工作。

综上所述,钱志熙从经文细读中所提示出来的独立于诗而存在的“赋文”活动虽多新义,但也不无疑义,要想把赋的起源问题推进到更为深入的文化原生态,还要从《周礼》的“六诗说”说起,这是我们下面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二)“六诗说”:赋的起源形态判定

对于赋的起源形态,各家说法不一。近来又有批驳赋为古诗之流说。或说诗“六义”出现于赋体产生之后,不能视为赋体的渊源;或说赋有二义,一为修辞,二为文体;或说赋体兼有比、兴二义,与文义之赋专指铺陈不同;又有所谓赋源的“多元说”;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分溯源流说,但仍然不能很好地说明赋的起源问题,正如周祖谟针对分溯源流论而言:“则作为总名之赋体之渊源无所依归矣。”^①程章灿也认为:“赋者古诗之流说,若从某一特定方面来看,自有其似非而是之处。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是很精辟的。”^②而我们认为:赋起源于“诗”的观念,在先秦尊“诗”的文化氛围中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言的“赋”,并不是指后代“毛诗”、郑玄、孔颖达、朱熹一路所阐释的“三体三用”说(风、雅、颂为诗体,赋、比、兴为诗用),而是认为赋为诗“六体”(风、雅、颂、赋、比、兴均为赋体)之一的“赋”,是不入乐的诗之一体。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一种押韵的叙事文体。如此说来,赋的起源不仅仅和“诗”有关,而且是在“六诗”“赋”体的影响下,在各体文学的相互渗透中(比如隐语、民间说话等)发展起来的。要说明这个问题,还要对《周礼》所言的“六诗说”作出古义的原本理解。

《周礼》中涉及“六诗”的共有两处,分别见于《春官》的《大师》和《瞽矇》,《大师》全文为: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本,以六律为

① 周祖谟:《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录早期作家之籍贯、身份推测赋体之来源》,《新亚学术集刊》第13期,第74页。

②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鼙。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帅瞽而庠；作柩谥。凡国之瞽矇，正焉。

《瞽矇》全文为：

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周礼》虽然没有对“六诗”作出更多的解释，但由其叙述的语境可以看到，这里所谓的“六诗”是和音乐相关的，所谓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据此学者也推定“六诗”是由大师教授，瞽矇学习并执掌的，它不是周代国学的教学内容，而是为乐工设立的部分教学内容。因此，断言“六诗”是周代诗歌教学的纲领，或曰“六诗”乃虞舜以降之乐教纲领，都与《周礼》之文相抵牾。这种论断无疑是有合理之处的，但作为古代诗、乐、舞一体的文学实践，乐中有歌、有诗也是可能的。

但自汉代郑玄以来，对“六诗”作出了政治的比附，六经便逐渐走向六义，变成“三体三用说”，以至现代学者也多遵循这种说法。至于《诗》之一体“赋”的文体特征，郑玄及其后的学者便各执己见，兹引述几例，以见一斑：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郑玄《周礼注》）

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既见赋、比、兴于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郑以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孔颖达《毛诗正义》）